

世界现代前期 哲学思想史

任宜敏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目 录

世界现代前期哲学思想史

一、概 述	1
1. 发展概况	1
2. 特征比较	11
二、欧洲哲学	18
1. 唯意志主义：尼采的哲学思想	18
2. 新康德主义	27
3. 现象学：胡塞尔的哲学思想	45
4. 实证主义	62
5. 生命哲学	75
三、欧美哲学	87
1. 马赫主义	87
2. 新黑格尔主义	101
3. 结构主义与分析哲学先驱的哲学思想	112
4. 实用主义：詹姆斯的哲学思想	121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	131
1. 《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132
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阐发	147
3.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	161

4.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贡献	165
5.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75
五、东方哲学	186
1. 中国哲学	186
2. 日本哲学：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思想	215
3. 印度哲学	225
4. 阿拉伯哲学	242

一、概 述

本书论述的是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东西方哲学。

显然,无论“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都不是一个具有精确、完整的内涵和内在、自洽的关联的系统,而只是分布于地球东、西两个半球上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区域的哲学的一种集合称谓。因此,本章先对这一时期东西方各民族、各文化区域哲学思想发展的总体状况及其成就作一简要介绍,然后从总体上分析比较该时期东方和西方各自哲学主潮的特征。

1. 发展概况

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曾诞生过显赫一时的思辨唯心主义庞大体系的故乡——德国的哲学。不过,我们现在遇到的却不是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而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唯意志主义既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的反叛,又是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最早学派。它最基本的思想是把情感意志和本能冲动置于理性之上,甚至将其理解为一切存在的基础和出发点;认为服从理性(抑或倡导经验)只会使人受外部世界的支配,无法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能动作用,从而失去自由,因此必须彻底改变哲学研究的方

向,即把注意中心转向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人的生命和情感意志。唯意志主义的创始人是叔本华,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尼采的哲学活动才发生显著影响的。尼采既直接继承叔本华关于意志是一切存在之本质、之主宰的思想,又在两个根本点上对叔本华的学说作了修正和发展,即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发展为不可遏制地创造一切、超越一切的权力意志以及把叔本华消极的悲观主义发展为奋发向上、争做超人的行为主义。他主张运用比笛卡儿更彻底的怀疑精神去批判、检验隐藏在传统哲学体系背后的一切前提,重估一切价值,用铁锤摧毁所有偶像。他通过对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论析,通过对基督教的批判,断然宣布“上帝已死”!随着上帝的死亡,对人类的古老看法、传统道德、永恒真理等等也都如覆巢之卵,荡然无存。尼采的学说对西方思想界造成了强烈震撼。

六七十年代,德国学界一批重要人物高举“回到康德去”的旗帜,按照时代的需要重新解释和改造康德哲学,是谓新康德主义运动。它很快形成了诸如实在论学派、马堡学派、哥廷根学派、弗莱堡学派等许多支派,其中马堡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的影响最大。前者侧重于从数学、自然科学或纯粹概念的角度去理解康德哲学,认为哲学是关于科学因而也是关于一切文化的各种原理的理论,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是揭示人的认识的先验结构以及人类知识的本性与局限性。后者则独树一帜地强调价值问题,认为认识论问题的实质是价值论问题,判断是一种价值形式,真理则为判断所肯定的价值;他们还把自然科学与历史(人文)科学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是对抽象的、普遍的规律的说明,后者是对具体的、个别的事物的描述。世纪之交是新康德主义的鼎盛时期,它的影响越出德语国家,扩展到荷、意、英、法等国,成为世界

性的哲学流派。

就在新康德主义运动开始从鼎盛走向衰落之际,以德国中西部城市哥廷根和南部城市慕尼黑为基地,崛起了后来演变成20世纪西方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现象学哲学运动。现象学的创始人埃德蒙德·胡塞尔认为,哲学的使命就是对认识本身进行批判,就是研究认识的可能性和客观性,就是超越一切相对性达到绝对终极有效的真理,并从方法上为经验科学奠定基础,所以她应该是所有科学中最高和最严密的科学,应该是代表了人类对于纯粹的绝对认识永恒要求的科学。这样的科学自然既不能还原到经验科学的层面,也不能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为此,他不懈探求能使哲学成为一门严密科学的可靠方法。当然,胡塞尔想建立作为严密科学的哲学的愿望并没能变为现实,但他开启的、要求摆脱权威(传统)的中介而直接“面向实事本身”的现象学精神,却不断地穿透着科学与生活的广阔领域。甚至他留下的一大堆问题,他不断否定自己的哲学探索的轨迹,也都无不激起后人经久不衰的兴趣。

把考察的聚焦点移出莱茵河,转向法国和英国,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一种与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都有着重大区别的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它首先产生于法国,随后跨越英吉利海峡,在英伦三岛进一步繁荣,从50年代起开始在法、英两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哲学必须以实证自然科学为根据,以可以观察和实验的事实及知识为内容;在尚未把握能为实证自然科学所证实的知识的领域,我们的任务就是运用实证自然科学的方法去获取这种知识。因此,实证主义要求拒斥“形而上学”,主张科学的标准是唯一合理的标准,要求把知识限

定在经验(现象)的范围内,致力于发现经验(现象)之间不变的关系。它承认自然和社会的运动变化,力图用演进的观点去解释运动变化,但却反对唯物辩证法;它提倡进步与改革,要求运用实证科学改造社会,但却反对社会革命。

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穆勒把自笛卡儿以来的心理主义传统发展到了顶峰,用联想心理学去解释外部世界和心灵(自我),解释人的认识行为,在逻辑学上,穆勒提出被后人称为“穆勒方法”的5条著名规则,把归纳逻辑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实证主义的另一位重要代表斯宾塞则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他称之为“综合哲学”的体系,企图为日趋专门化发展的自然科学各个分支乃至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提供统一的方法和理论基础。

实证主义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事实表明,无论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或是穆勒、斯宾塞,都没有像他们所自称的那样完全拒斥“形而上学”,他们也都不是非思辨的哲学家。唯其如此,后来的马赫主义(亦称第二代实证主义)才要求进一步清除实证主义所蕴涵的“形而上学”残余。

传统理性主义在面对19世纪末叶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时所日益暴露的无能为力以及对科学采取非批判态度的实证主义的盛行,从不同的角度激发莱茵河两岸的一批思想家另辟蹊径。他们下定决心要全面清算并坚决反击传统理性主义和盛极一时的实证主义,强调以人的生命、生活、价值和历史文化为哲学探索的主题,发誓要重建人的价值和精神价值。这就是与唯意志主义有着直接联系、但不是强调意志而是高扬生命冲动,不是突出个人而是注重历史的生命哲学。这一哲学思潮的早期代表是德国的狄尔泰、齐美尔和奥伊肯,而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

则是法国柏格森的哲学思想。

狄尔泰强烈要求把生命(不是个人的生命和心理过程,而是人类的生命)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强调人类生活实质上是历史的,生命作为相互影响的、时间上相续的事件就是历史生活,认为生命是在理智和文化上被构成的,对生命的体验、理解和解释乃是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精神科学的使命。因此,他毕生都以构建一种新的精神方法论为职志。齐美尔直接继承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并通过对生命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发展阶段的探讨发展了狄尔泰的思想。奥伊肯的研究角度与前两人大致相似,但更强调精神生活与历史的关系,主张历史是精神生活的枢纽和具体化。与狄尔泰等人侧重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有所不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带有明显的生物学倾向。他广泛吸取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特别是心理学和生物进化论的思想,用运动变化和整体联系的观点去阐明生命现象。柏格森的哲学创造活动把生命哲学思潮推向了全盛时期,不仅使之广泛影响了法国、德国、英国和美洲大陆的哲学界,而且波及到科学、文学和宗教领域。

自 17 世纪末叶开始,牛顿确立的经典力学体系不仅上升为自然科学各个分支的典范,而且逐渐渗入欧洲精神生活的深层结构,甚至连一度激烈反抗的教会也开始使其信仰原则与牛顿力学描绘的关于物理世界的科学图景调和一致。而依据经典力学去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空前未有、愈益辉煌的成就,更是消除了关于它的方法的有效性的任何疑虑;在许多人看来,剩下的工作似乎只是使经典力学方法向生活、精神和历史领域扩张。但是,世纪之交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对把牛顿力学视为人类知识典范的观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在(主要是)物理学界乃至哲学界引起了混乱和不安。

在这种背景下,奥地利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马赫一面奋起捍卫实证主义原则,一面主张进一步清除实证主义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残余,拒绝使用与经验事实没有推演关系的范畴和理论,从科学理论中剔除诸如本质、实体等等无法还原为对感性要素的观察或无法验证的累赘内容,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能把科学的各个部门统一起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20世纪初流传广泛、影响遍及奥、法、英、意、俄、美等国的马赫主义由此兴起。除马赫外,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还有阿芬那留斯、彭加勒等人。阿芬那留斯独立地提出和阐述了与马赫大致相似的哲学观点。彭加勒的许多思想都有别于马赫主义者,但由他集大成的、对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亦称第三代实证主义)有重大影响并被数理逻辑学家广泛接受的“约定论”,则被认为是对马赫主义的一种补充和发挥。

19世纪下半叶,欧美各国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垄断资产阶级从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物质利益、阶级利益和政治利益出发,把自己打扮成国家和民族的化身,要求改造以强调个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为出发点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国民意识,由强调个人转向强调国家。显然,实现整体和绝对的黑格尔哲学十分适合于论证这种新的需要。于是,复兴一度遭冷落的黑格尔哲学的新黑格尔主义思潮就在率先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英国首先出现,并迅速在社会制度及哲学思想方面与英国属于同一传统的美国引起反响。

新黑格尔主义不是一个具有统一观点的完整的学派,而是继承、改造和发挥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绝对唯心主义传统的各种思潮的总称。与拒斥“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等哲学流派相反,新黑格尔主义者坚持把诸如世界的终极实在、世界的本质

等问题作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他们同黑格尔一样,以绝对的、统一的精神为实在;但黑格尔是把理性的精神实在化,从而把精神的发展视为理性的辩证发展,新黑格尔主义者则吸取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流派的思想,把非理性的精神实在化,从而把辩证法非理性化。新黑格尔主义的早期代表是英国的斯特林、密林等人以及美国的圣路易学派和罗伊斯等人。就理论形态的代表性以及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英国的布拉德雷和意大利的克罗齐最为突出。

美国哲学的黄金时代以实用主义的兴起为标志。实用主义是独特的“美国精神”的哲学概括。它的产生一方面受到 19 世纪末自然科学新成就,尤其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直接影响,另一方面又是兼收并蓄 19 世纪以来产生和流行的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产物,例如,它继承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的基本观点,拒斥“形而上学”,把哲学归结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把人类知识限定在经验范围,而在具体解释经验时则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是皮尔士。他在分别刊载于 1877 年和 1878 年的美国《通俗科学月刊》杂志上的《信仰的确定》和《怎样使我们的观念清晰》两篇论文中确立了实用主义的哲学立场和基本观点,但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 1898 年,詹姆斯重提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原则,并将其发展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实用主义理论体系以后,实用主义才迅速成为美国哲学界的最重要思潮。后来,杜威将皮尔士和詹姆斯的思想又作了重大发展,并把它运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从而把这一思潮推向了鼎盛时期。实用主义在世界各地均有流传,它的影响也不单纯限于哲学范围,而是渗透到法律、历史、政治、教育和行为

科学等领域。

这一时期,与上述各种哲学流派的性质都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发展,并在指导世界两个半球的工人运动过程中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传播。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为了从理论上透彻、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为了用经过严密、科学论证的理论来教育工人阶级,指导他们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把理论研究的重点转到一度中断的政治经济学上。这项艰苦卓绝的研究的主要成果,集中凝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第一卷以及篇幅浩瀚的《资本论》全书的手稿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把唯物史观作为严格的科学方法论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且通过解剖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范畴作了严密的考察和验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而成功地制定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方法。因此,《资本论》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恩格斯在这一时期不仅和马克思一起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阐述。马克思逝世后,他不仅承担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艰巨任务,而且通过深入研究古代社会史,通过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通过批判把唯物史观庸俗化、教条化的倾向和思潮,捍卫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一时期,对传播、阐发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付出艰辛劳动、做出具体贡献的还有狄慈根、拉法格、梅林、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等人。

我们的考察通过漫长的跋涉,从西方返回东方,返回我们自

己的祖国，首先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旷日持久、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大论战。这场论战既是两种政治主张的对垒，也是两种哲学思想的冲突；既是维新运动以来社会思想解放的继续，更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哲学革命。论战最后以革命派的胜利和改良派的失败告终，从而不仅在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层面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而且对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哲学上的最主要代表是章太炎和孙中山。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前后期互相矛盾。前期，他尖锐批判了有神论，探讨了宗教产生的根源，得出了与费尔巴哈“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的观点相类似的结论；建立了以欧洲近代自然科学“以太—原子”论为基础的宇宙观和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的认识论；提出“强力以与天地竞”的进化论思想，并深刻地主张以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的改进作为衡量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标志。后期，他从激励人们充分发挥能动作用、振奋革命精神以及纯净人的心灵、增进国民道德的考虑出发，主张建立无神教；以佛教唯识宗的三性、四分、八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理论支柱，并糅合康德、费希特、叔本华等人的思想，构造了“心一识”为本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具有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提出“俱分进化论”，并由此走向了虚无主义。孙中山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吸取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最新成就的基础上，总结了资产阶级哲学启蒙以来的积极成果，在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诸方面都既有超越前人的重大建树，又包含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许多出于革命的需要而去寻求哲学武器的革命家一样，他的哲学观点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紧密相关。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他没有能够来得及系统地整理和阐

发自己的哲学思想；无论建树或者缺陷，都带有深刻的时代烙印。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在明治中期随着斯宾塞进化哲学的风靡全岛，思想界分化为主张自由民权和提倡国家至上的两大阵营；通过著名的“人权论争”，前者孕育出中江兆民较为系统的唯物主义哲学，后者发展为井上哲次郎和人西祝的学院派哲学。被誉为日本第一个独创性哲学的“西田哲学”，就是在承袭并发展学院派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

世纪之交活跃于印度哲学舞台的著名哲学家是辨喜和伊克巴尔。辨喜一方面秉承古代印度哲学的传统，尤其是吠檀多论，坚持实在的一元性，另一方面兼收并蓄东西方各种哲学精髓，强调要按照时代的需要来重新阐释吠檀多思想；他在宇宙论、认识论、宗教观、社会政治观诸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和时代气息的思想。伊克巴尔虽然深受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西方哲学家的影响，但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都渊源于伊斯兰教；他从事哲学研究之目的是要消除对《可兰经》的误解，重建伊斯兰宗教思想。他倡导要复活人，主张肯定和发展自我。认为神与人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本质上同一的；整个物质世界乃至神都属于自我的性质；而要揭示自我的本性，只能诉诸直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与之相伴的是思想领域兴起了泛伊斯兰主义和启蒙运动两大主要思潮。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是阿富汉尼及其学生阿卜杜。他们把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解释为不包含任何超自然内容的信仰的理性主义体系，从保卫伊斯兰教的立场出发，号召全世界穆斯林紧密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基督教国家的侵略。启蒙思想家广泛吸取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法、英等国的资产

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以及哲学理论,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理想,高扬人的尊严,提倡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系统传播铺平了道路。

2. 特征比较

世纪之交的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有两大显著的共同特征:

第一,无论东方哲学或西方哲学,都广泛吸取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尤其是生物进化论的思想。

就西方哲学而言,唯意志主义、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生命哲学、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等流派都在不同程度上自觉地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论证各自的哲学主张;尼采批判地吸收达尔文进化论思想,把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推广到包括无机界和人类社会在内的整个宇宙,以此来佐证其权力意志学说;朗格从达尔文生存竞争学说出发,提出并论证他的社会改良主义理论;柯亨等人运用世纪之交自然科学的最新材料去解释和改造康德哲学,论证其新康德主义观点;通晓当时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柏格森,综合吸收了心理学、细胞学、生物进化论等科学理论,他的生命哲学带有明显的生物学倾向;实用主义是在19世纪末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重大发展,尤其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达尔文主义不仅动摇了此前在美国确立的唯心主义权威,使以实验方法对待哲学的发展成为可能,而且使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人在世界的地位的认识发生了巨变,进而产生了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主要作为一个行动者出现;至于被其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一再强调为“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和马赫主义,更是把自然科学的标准奉为唯一合理的标准,

主张以自然科学的实证精神来改造哲学。

就东方哲学而言,虽然各国对从西方进口的欧洲近代自然科学成果的译介并不系统,理解也不深刻,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却相当重视吸取并运用自然科学成果(特别是进化论思想)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章太炎不仅认真研究并接受了哥白尼以来欧洲近代天文学和力学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视天论”的宇宙论,而且自觉运用进化论思想去驳斥天命论、有神论和上帝创世说,探讨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论证其民主革命的主张。孙中山同样从进化论出发去解释历史,甚至解释人性,认为人类先祖与禽兽无异,后经几许万年之进化,始长成人性;与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不同,人性的根本乃是互助,这决定了社会国家与伦理道德的一致性。日本早在 70 年代就延请美国进化论者摩尔斯来日任东京大学教授,他的讲学、译介和著作直接推动了进化论思想在这个岛国的传播。与此同时,心理学、动物学、细胞学及自然科学其它领域的各种新知识也陆续传入日本,对日本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纪之交,日本哲学界有不少人自觉运用这些新知识、尤其是心理学和进化论去探讨宗教、道德、人生等问题。印度哲学家和阿拉伯哲学家同样注重吸取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在维护传统价值的同时,力图使之与科学的发展趋势携手共进。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直截了当地用自然科学知识为武器来论证、宣传自己的哲学和政治主张。例如,黎巴嫩的舒马伊尔不仅拥护、捍卫和竭力推广达尔文进化论原则,而且把它同唯物主义一起奉为摧毁迷信与极端保守(他称它们是东方的两大毒物)的唯一解毒剂。

第二,无论东方哲学抑或西方哲学,都带有鲜明的非理性主义色彩。

就西方哲学而言,诸如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色彩自不待言。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在“回到康德去”和“复兴黑格尔”的旗帜下面同样表露出明显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实用主义虽然把哲学归结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把哲学和人的认识局限于经验范围,但它对经验的解释却遵循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即把情感、体验等都当作有实在意义的经验,并强调理性只是意志的工具,无法达到事物的本质。

就东方哲学而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家,特别是章太炎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十分引人注目。日本的“西田哲学”虽然广泛吸取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并且是采用西方逻辑构建起来的,但实质上,它却是一种奠基于经过日本的固有宗教即神道教的滤色镜过滤的佛教思想的宗教哲学。印度哲学一向崇尚禅思式的直觉,强调唯有通过它才能领悟实在、获得真理;这种传统丝毫也没有因为跨入现代的门槛而被丢失。在阿拉伯哲学中,倡导泛伊斯兰主义的哲学家虽然用“合理性”定义宗教,把宗教解释为信仰的理性主义体系,但在探讨人类知识的范围时,他们(特别是阿卜杜)又表露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不少研究者在探寻非理性主义的源头时都曾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和印度),都认为非理性主义是东方的特产。如果这种观点能够经得起检验,那么我们可以说,尽管有许多史学家花了不可胜数的笔墨探讨这一时期西学紧随殖民者的战舰、铁路东渐的激流,但在这一激流的底蕴,却涌动排荡着一股与之相向的潜流,即东学西渐的潜流——世纪之交西方哲学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突现就是这股潜流的明证。或者说,世纪之交乃是东西方哲学开始迈向实质性的会通、融合,并

在此基础上开拓、创造的时期。

除了上述两大共同特征外,这一时期的东西方哲学又各具自身独有的一些特征。读者可以从分述如下的这些特征中宏观地把握世纪之交东西方哲学的走向。

先就西方哲学而言,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流派纷呈,各流派所专注的对象、探讨的问题、提出的范畴、运用的方法等都各不相同,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差异性背后,又存在一定的承续性和一致性,因此可以概括出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和思辨唯心主义这三种思潮或传统。科学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把自然科学的标准奉为唯一正确的标准,主张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方法论、认识论;人本主义强调真正的哲学乃是人的哲学,因此特别注重人本身的内在结构或人的本真存在的研究,高扬生命、本能和情感意志;思辨唯心主义一般并不回避“形而上学”问题。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思潮或传统的开创者,大致属于这一传统的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等流派。唯意志主义是人本主义思潮或传统的奠基者,大致属于这一传统的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流派。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则可归属于思辨唯心主义的传统。这一特征表明,世纪之交的西方哲学开始从传统的绝对主义、一元主义走向相对主义、多元主义。

第二,开始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古希腊时代的智者高尔吉亚曾提出过三个箴言式的命题,即: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即使有物存在而又可知,也不可能把这样的知识传达给别人。这三个命题仿佛是对西方 2000 多年哲学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轨迹的预言。如果说,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是西方哲学由古代进到近代的一大标志,那么,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就是它从近代迈入现代的一个